



魏清散文选

◎ 魏 清 著

湘籍作家**魏清**散文作品精选

一个退休老人发自肺腑的心血之作
一部真正不溢美、不掩疵、不掺假、不矫情、不粉饰、
不虚情假意、不无病呻吟的作品集

心灵需要慈悲之心，心灵需要宽容之心，心灵需要感恩之心。只要读一读《魏清散文选》的亲情世情、域外风情和杂感性随笔，你都能从不同的视角感悟到这种心灵的境界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序

心灵的真诚对话

冰 静

我本不认识魏清先生。去年的一天，他远从重庆回故乡湘潭省亲，经文联友人引见会晤，因是同龄人，又均爱好写作，便一见如故了。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。

当时，我正在负责编辑湘潭文联的文学季刊《君子莲》，他将几篇大作交给我，并再三声明，习作而已，粗糙得很，能发便发，任君处置。我仔细阅读完文稿，按刊物的要求，选发了其中的《菊夫子》——状写一个善良忠厚的农民、质朴如泥土的劳动者，形象鲜活，跃然纸上，至今仍烙在我的记忆之中。由此，我对这位从事工程的魏先生的文笔便刮目相看了。

一年之后，魏先生的散文选这叠厚厚的书稿，便赫然呈放在我的案头，并嘱我写序。于是，有机会于夜阑人静时分，潜心拜读，而至于激动不已，恰如同魏先生促膝而坐，听他痛说家世，诉说人生，评说世道人心。透过字里行间，仿佛于滚滚红尘之中，分明窥见一群饱经磨难的知识分子的心在怦然跳动，在挣扎，在呼唤。这令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自况所述，“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，以饲别人，虽自觉渐渐瘦弱，也以为快活。”魏先生是如此，我们这些不幸和幸运中的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

读魏清先生的散文，让我感兴趣且感触很深的是散文写作中的姿态。

散文应是一种心灵自由的表达。好的散文其实就是作者自我的一面镜子，透过镜子，我们能够窥见作者的内心世界。因此，散文一定是透明的，清澈见底的。而那些不敢亮出内心的散文，多半是矫饰的、虚伪的，甚至是带有蒙骗性的。散文的宗旨，是从心灵表达出真实的情感，散文写作都应该采取一种真诚的姿态，这是散文写作最基本的要求。但由于个性、世界观、价值观的不同，作者的真诚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，有的是从霸气里透出真诚，有的是从忧郁里透出真诚，有的是从亲和里透出真诚。而魏清既不霸气，也不忧郁，更不有意地滥情，他的真诚包含在心灵的对话之中——与亲人的对话，与朋友的对话，与同事的对话，与熟悉和陌生人的对话，与自己的对话。可以说，魏清在散文中始终坚持着一种诚实的、老少无欺的对话姿态。

一个权威的时代、一个经典的时代渐渐解体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宽松的对话时代。人们试图以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思想意识中的冲突，以对话方式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。与叙述对象的对话，与心灵的对话，最终都是为了与读者对话，这也是对话姿态的意义所在。魏清先生不论是与父母、亲人的对话，与外面世界的对话，与世道人心的对话，与历史与现实的对话，既不盛气凌人，也不居高临下；既不汪洋恣肆，也不卿卿我我。因此，人们阅读魏清的散文，不管领不领情，接不接受他的观点，都会倾听他娓娓的叙述，乐意他的表达。说到底，对话的姿态就是一种平等的姿态，一种民主的姿态，一种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姿态。

这种真诚姿态的核心就是一个“情”字——浓浓的亲情，眷眷乡情和触目的世情。尤其是细腻地款款叙说了父母的养育之情，恭敬地、虔诚地描摹了父母的再造之恩，从而以工笔

蘸血，刻画出了父亲、母亲的大爱大德凝重形象。文选中，《我的父亲》、《怀念母亲》、《烟塘》道出了作者的真诚情感。一个家道中落的大户人家，严父慈母，以病弱之躯，于艰难竭蹶之中养育着七个儿女，一个个都完成了高等教育的学业，成为国家有用之材，这是何等的功绩和功德！这种养育之情，再造之恩，大如天地，天有多大，情有多大！地有多大，恩有多大！

散文是心灵的叙写。而心灵是有品级的，譬如敬畏之心就是心灵的最高境界。从作者对亲情的眷恋，可以触摸到上一辈人对艰难生活、对坎坷的人生、对无可奈何的世事，都怀着宗教般的虔诚和从容，任凭风吹雨打都不动摇。这种对待生活、人世、人生的敬畏之心，是对传统文化、传统道德的坚守，感染并熏陶着后世。他们把这份精神遗产继承下来，以对父母的敬畏直面人生，开拓生活前进的道路。这就从思维、品质的层面，提升了作品的品味。这种精神文化的传承，这种对待生活的淡定，在《大哥》一文中作了淋漓尽致的抒写。

心灵需要慈悲之心，心灵需要宽容之心，心灵需要感恩之心。只要读一读《魏清散文选》的亲情世情、域外风情和杂感性随笔，你都能从不同的视角感悟到这种种心灵的境界。有了境界，散文便有了品格。如同心灵的品级决定人格，决定人的一生。

早些年，因国企改革“一刀切”，人员分流，魏清56岁时提前退下来，本该安分守己、超然世外地安享退休时光。但他偏不甘寂寞，却要鼓起眼睛看世道，打着良知论人心，于是有了一组心语漫笔和杂谈随感，用笔代言，想说就说，说长论短，坚守一个“理”字。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的涉世良知和不吐不快的执著吧。世道清明，言者不罪，幸哉！

《魏清散文选》共28篇文章，其中大部分曾先后在国内书刊和几家文学网上发表过，受到文友和网友的充分肯定，可以说是接受了广大读者的检验。在此基础上，作者又广泛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，反复斟酌，几经修改，才决定结集出版。其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和拳拳不弃的精神，令人感佩。

写作于魏先生来说，既是心灵的表露、心灵的呼唤，也是真诚的对话。看来魏先生的文章还得做下去。出世为人，入世做事，但愿魏先生今后多在“提炼”上发力，期待写出更多的佳作来，为自己，也为别人。

是为序。

辛卯冬日

（冰静，湘潭教育学院文学教授，湘潭文艺评论、文学研究会副主席，湖南作家协会及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目 录

序·心灵的真诚对话冰静

我的父亲

怀念母亲

烟 塘

大 哥

童年夏日

小外孙

一件心酸的事

值得永远尊敬的革命老兵

菊夫子

编辑老林

“文革”轶事

书本对人最公平

学外语的遗憾

最便宜的午餐

装修新房的姑娘

文鸟夫妻

令人神往的梵蒂冈

巴黎遇贼记

让人感佩的意大利修女

利比亚印象

中布友谊之花在布琼布拉开放

出国往事

感受乌镇

从评价鲁迅所想到的

知足与无求

长兄和他的旧体诗

当前文学写作的浮躁病

向网友说说心里话

后 记

我的父亲

—

我们家世居湖南，我们兄弟姊妹都是在湘江边长大的。湘潭人称父亲为“伢老子”，平时只喊一个字——“伢”，比方说，儿子要出远门了，对父亲说：“伢，我走了，你老人家多保重。”“伢”这样的称呼，可能母亲觉得不够亲切，又不大文雅，也不好听，因此让我们遵照母亲老家——江苏的习俗叫“爹爹”。

父亲中等身材，白皙清瘦，平时，他总是穿着一身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的衣服，虽然衣服的质地并不怎么好，但剪裁合身，大方得体，让人看着舒服。他言语不多，外表不苟言笑，喜、怒、哀、乐极少表露出来，给人的感觉很宁静，是一个文质彬彬、举止安详，有修养的人。或许因为长期经历世事的更迭和生活的坎坷，使他内心受到某些打击的缘故，他那平静的目光中，总是含着一丝隐隐的忧伤，使人感到有些沉重。

父亲出生在湘潭县一个当时颇为富裕的大户人家，祖辈给他取了一个既响亮又文雅的名字——健芝，大概是希望他一生中能够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的，不仅身体健康，而且人品也像芝兰一样高洁。

我小时候，每当听到周围的人称呼父亲“健芝先生”时，就感到特别高兴，认为父亲像教书先生一样受别人的尊重；有时，人们叫他“二先生”，因为父亲排行第二，听起来也比较自然；而使我最为不喜欢、也最不习惯的是有人称父亲“二老爷”，一边叫还一边卑微地弯着腰，让我感到极不舒服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总觉得看起来不顺眼，听起来也不顺耳。

我大一些后，知道了父亲的生日是农历六月初六，因为这一天母亲总忘不了给父亲下碗挂面，家乡的习俗称之为“长寿面”。家境好时，面里少不了有个油煎荷包蛋，后来穷了，蛋没有了，不过面总还是有的。按照中国的民俗，六六寓意着大顺，可是父亲的命运却充满坎坷和波折，见不到大顺的痕迹。父亲幼年时，体弱多病，童年便少了许多欢乐；青年时，虽然家境尚殷实，生活上还过得不错，但封建礼教的桎梏，让他的思想和行动受到很大的束缚，理想和抱负得不到施展；中年时，遭遇战乱和动荡，虽然父亲从事过文秘、行政人员之类的工作，但忠厚、软弱本性，盲目的善良，加上不谙世道险恶的书生意气，因而使他在事业中累受挫折，命运坎坷多舛，甚至差一点断送了自己的性命；晚年时，赶上政治风云突变，他拖着病弱之身还要承受精神上的打击，在贫困交加中，苦苦挨到生命结束，终年未满五十岁。父亲的一生，多灾多难，尤其最后的几年中几乎没有过上几天舒坦的日子。早年虽生长在有钱的大户人家，生活条件优越，但他不是那种只顾自己，不考虑他人，不管家庭和孩子的人，因此，父亲大半辈子并未享过多少福，至少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是这样。

父亲的人品好，正直而善良，不论环境如何，他都能用平静的心态看待一切。风光时，作为一个富家子弟，生长在有着几千多亩田产、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之中，他又掌管着这一大家子的钱粮和账目，却从来不盛气凌人，更不张扬跋扈，绝不去欺压周围穷苦的老百姓。相反，他很同情怜悯这些弱者，总想给点力所能及的帮助。落魄时，定为剥削阶级分子，成为了改造对象，只好带着生病虚弱的身子去干他从来都未干过的重活，在寒冬腊月的淫雨霏霏中，穿着草鞋，踩着泥泞去修堤筑坝。即使这样，他也从不怨天尤人地去埋怨时运，去记恨他人。父亲性格上是个懦弱的人，但无论遭受任何磨难，却从不在我们面前表露出他的痛苦和悲伤，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去忍受……每当想起父亲晚年的生活情景，我心里就感到非常难受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在父亲的人生旅途中，始终有一位温良贤淑、关心体贴、无怨无悔地照顾他的伴侣——我们的母亲，长年累月地和他在一起，相濡以沫，同甘共苦，互相扶持，

风雨兼程地度过了这一生。

二

父亲为人处世，一辈子始终贯穿两个字：“仁”和“忍”，仁义和忍让成为他的立身之本。我们的祖母和曾祖母在她们的一大群子孙中，最喜欢的就是我父亲，她们所看中的，想必也是父亲的这一传统品德。

抗日战争前，祖母在世时，很是疼爱自己最小的女儿——我们的小姑姑，临终时，放心不下这个最小的女儿，考虑到她以后的归宿，特地将我们父母亲叫到床前，嘱咐他们今后要好好照料她的生活，并且日后为她找一个好的婆家嫁出去。谁知世事难料，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，祖母去世不久，抗日战争爆发，日本鬼子打到了湖南，到处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，我们全家人在战火纷飞中逃难。在一次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扫荡中，我们的小姑姑被凶残的日本兵用刺刀顶着胸口，差一点丢掉了性命，小姑姑受到如此大的惊吓，精神失常，大白天说胡话，常常指着蚊帐的顶部惊慌地喊着：“火！火！火！”后来，虽然病情稍有好转，但言行举止还是处于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的状态，好端端的一个人从此便成了神经错乱的精神病人，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。祖母逝世后，父母亲遵照她老人家的嘱托，尽心竭力地照顾小姑姑，二十多年，小姑姑一直与我们生活在一起，直到一九六一年自然灾害年间患病疾病故，终身未嫁，可怜一生。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，父母亲忠实地履行着祖母交代的事情，一直将小姑姑作为家庭的一员，责无旁贷地照料她，竭尽所能地呵护着这个最小的妹妹。

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中，我家被抄家，土改工作队从我们居住的阁楼里，搜出两个装着贵重物品的盖箩（一种上漆的竹编家具，箩筐大小，呈腰子形，有盖，分上下两层，盛器物用），摆放在我们家的天井中，工作人员站在旁边，一边清点物品，逐个验收，一边登记在册。

当盖箩掀开时，我好奇地站在最前面，七岁的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我从未看见过如此多的财宝，两只盖箩里，装着满满的手镯、头簪、戒指、项链、耳环等各式各样的金银首饰，下层则装着些珠宝玉器和杂物，还有小巧玲珑的金元宝，黄澄澄，金灿灿的，在阳光下直晃眼睛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这些财物，全都是祖母临终前嘱托留给小姑姑以后出嫁时的陪嫁。这些贵重物品在我家已经存放十几年了，居然丝毫未动。

今天想起这件事，仍然使我心情激荡，久久难以平静。

从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，这段长长的动荡不安岁月中，可以想象，在那种兵荒马乱，战事连绵，生命都很难保障的日子里，要完好无损地保存这笔价值不菲的财富，需要操多大的心，费多大的劲，担多大的风险。

解放前几年，我家名义上还有祖上留下的一百多亩田产，但战乱和天灾的影响，收成很差，我们父母亲又不忍心让佃户雪上加霜，因此宁肯自己过得紧一些，也不愿逼迫佃户交租，能收一点算一点，收不到的情况也常见。全家十一口人的生活几乎全靠雇工自耕二十亩田来维持。那时家里的伙食并不好，平日里见不到荤，大概一个月才打一次牙祭（吃肉类食物），只有在插秧、扮禾（收割稻子）、端午、中秋、春节几个大的农活和节日里才改善伙食。当时，我们兄弟姊妹上大学、中学、小学，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因为读大学和读中学的哥哥姐姐大多住读，每年开学前总要东挪西借，好不容易才能凑齐学费，以至，连父亲看病的钱都没有了。父亲常常苦笑着向我们说：“欠别人家的债，还可以躲一躲，欠你们的债，却怎么躲也躲不脱。”在如此窘迫的情形下，为何父亲那样死板地苦苦撑持？难道，不可以灵活一点，动用些亲妹妹的财产贴补一下家用，缴纳我们的部分学费，或者给他自己看看病，治疗一下，这总该吧！何况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小姑姑，也决不会反对的。可是，仁义的父亲，忠贞不渝地信守着对祖母的承诺，尽心尽力保管好小姑的这份陪嫁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诱人财物，竟然毫不动心，分文不取，这在当时那种物欲横流、唯利是图、尔虞我诈、巧取豪夺的现实社会中，实在是很难得的。

三

父亲一生都在仁义和忍让中生活，很少动怒。不过，一向平和的他，也有例外的时候，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曾有两次大的生气。

一次是解放前的一个夏天，在湘潭县烟塘住的时候，读中学的二哥和三哥放暑假在家，母亲进城买了两盒蝴蝶牌牙粉给他们，圆圆的盒子，装潢很漂亮，当时属罕见之物。那时，一般乡下人，刷牙都用盐或白麻灰，许多人一辈子连牙粉、牙膏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。也许是两盒牙粉稍有差异，二哥和三哥竟在分牙粉时发生争执，吵起架来。父亲看见了，非常生气。平常，他总是和母亲一样经常教导我们：“小时同窝鸟，长大各自飞，以后你们想要聚到一起都难呐！”。父亲最不愿意看到儿女们不团结，不友爱，而现在，两兄弟竟为了这样芝麻粒的小事，居然没有一点互相忍让的精神，竟然争斗起来，父亲很是气愤，顺手拿起插房门用的木杠子，举起来要打两兄弟，两个哥哥见势不妙，赶忙跑出去逃之夭夭。

还有一次，那时，我们住在湘潭市三义井，我的弟弟读小学一年级。有一天，贪玩的他不愿意上学，父亲知道后，气极了，在父亲的观念中，上学读书是头等重要的事情，小小年纪就不学好，实在不可饶恕，于是拿起竹扫帚，像赶鸡一样打着弟弟去上学。幼小尚不懂事的弟弟，只好哭哭啼啼地背上自己的书包，用衣袖擦着眼泪，慢吞吞地去上学。从此以后，弟弟再也没有逃过学。1965年弟弟赶上了“文革”前最后一批高考，顺利地读完了师范大学，成为我们兄弟姊妹七人中的最后一名大学生。后来，弟弟成为教师，先后在中学、大学任教。至今，他仍忘不了父亲对他的严格要求，还用这件事来教育他的儿子。

其实，父亲是极少打骂孩子的，我和二姐就从未遇到过。二姐懂事早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她不仅学习用功，而且十三岁的她还是当时家里的主要劳动力。我从小体弱多病，胆小怕事，自认为除了读书外，别的什么都干不了。即使这样，在湘潭县赵家岭居住时，八岁的我，仍然要和二姐一起到山下去挑水，二姐挑大桶，一百多斤重，我挑小桶，四、五十斤。那时父亲疾病缠身，不能干体力活，只有靠我和二姐把水挑上山去，再由母亲从桶里一瓢一瓢地浇到菜地里。

在赵家岭的日子，是我们一生中最贫困的时期，这段凄凉的时光让我刻骨铭心。

土改后，我们家的房屋财产被没收，我家从烟塘搬迁到赵家岭的土墙茅草屋，缺吃少穿，清汤寡水的饭菜……这些仅仅只是生活环境和条件的恶劣；对于父母亲来说，更难受的是，精神上又遭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。

那些日子里，我们家的生活也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，家庭收入少得可怜。当时，大哥、大姐、三哥在部队参军，实行供给制，没有薪水，只有每月三、五元（按现在的人民币值计，下同）的零用钱，二哥正在读公费大学，家中还有七口人，年老的外婆腿有残疾，干不了活，父亲久病，丧失了劳动力，小姑姑神经错乱，弟弟才三岁，家中的主要农活，全靠母亲和读中学的二姐来承担，读小学的我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。哥哥、姐姐将部队发给用来买牙膏、肥皂、卫生纸等日用品的零用钱尽量节省下来寄回家，共计八、九元钱，这就是家里的全部收入。日常开销中，除去每年必须缴的学费外，这些钱仅够买点油、盐和部分口粮，为了填饱肚子，只有在煮饭时掺一些干蚕豆、红薯干或芋头来充饥。

当时，我们居住的茅草屋，破旧不堪，泥土墙上的茅草顶棚年久失修，房子又在赵家岭的山顶上，周围没有任何遮拦，一旦遇到狂风暴雨的天气，简直是大祸临头，尤其是在夜间，狂风一吹，屋顶的茅草一把一把地被风刮跑，顷刻间，雷电交加，呼啸的大风伴随着倾盆大雨，从屋顶直往里灌，我们害怕得要命，躲来躲去，惊恐万分，茫然不知所措，然而，这时父母亲却出奇地镇静，他们在无能为力的处境中，默默地坐着，一直守候到天亮。后来，我上初中时，读到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其中描写的情景与我家的遭遇很相似，一家老弱病残，面对灾难，无助又无奈的悲凉，几乎是我们家那时的真实写照。

在赵家岭生活时，父亲因为夜间咳嗽气喘，怕影响我们，自己单独住一间最差的房间。

这间房狭窄矮小，没有窗户，又黑又潮，室内充满霉臭味。

一天早晨，我发现父亲脖子上有一道泛红的伤痕，似乎被什么东西划过，便疑惑不解地问父亲：“爹爹，你这地方是怎么搞的？”父亲摸摸脖子，平静地说：“昨天晚上，睡觉时被蝎子蜇了。”我听得毛骨悚然，看着父亲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当时很不理解，没想到软弱的父亲会有如此的沉着。

我心目中的父亲，什么都好，惟有软弱的秉性，我很不以为然，父亲凡事都逆来顺受，从来也不去抗争。

母亲曾经给我讲过一件事。

解放前，父亲担任湘潭县政府的录事，负责抄抄写写方面的工作，一个月的工资有二十几块光洋（银元）。一段时间后，上司看他工作认真，被推荐到石潭乡当粮站主任，负责保存和上缴全乡的公粮。父亲仁义，完全信赖下属，放手让他们工作。没想到，因为一时疏忽，被人乘机捣鬼，下面的工作人员认为父亲软弱可欺，乘机盗窃一些征来的公粮，然后，将秕谷掺入公粮中充数。此事被人告发，涉及不知情的父亲，罪名不小，说父亲贪赃枉法，弄虚作假，将上缴的公粮以次充好，眼看着就要吃官司，懦弱的父亲无法承受这突然而至的打击，却又无力证明自己的清白，绝望中只想到自己一个人来承受，便服毒自尽以求解脱。幸亏母亲及时发现并全力抢救，才留下一条性命。后来，母亲又到处奔波，终于找到证人，证明了父亲只是管理失察，并非自己所为，方才逃过此劫。

四

父亲的晚年生活困苦，病痛折磨，加上政治气候的严峻，精神上的压抑，平日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感到高兴的。惟有两次喜悦，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一次是1954年，家里收到了大哥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补发的工资，母亲极力主张父亲去武汉看看儿女，当时大哥、二哥、大姐都在武汉，好几年都未见到了。几天后，母亲照顾着虚弱的父亲上路了。

大约一个多星期后，父母亲从武汉回来了。

父亲对这次难得的旅行感到格外的高兴，到家几天里兴奋不已，津津乐道，像讲故事一样，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起来。他说，在我大哥的陪伴下，他和母亲一起徒步上洪山，费了好大的劲，登上了宝塔的最高一层，极目远望，俯看武昌全城，人来人往像蚂蚁，房子像火柴盒，很有些“君临天下”之感。还讲到，在寺庙里，他们吃了一顿和尚做的斋饭，一些素菜做成了鸡、鸭、鱼、肉的模样，像极了，味道也很不错。父亲还颇有感触地跟我们讲起当地的风土人情，他说，湖北人挑担子、抬东西时，即使并不很重，也要“嗨哟、嗨哟”地大声喊着号子；而湖南人则不同，挑起担子来，哪怕肩上压得再重，连气都喘不过来，也从不吭一声，埋着头走得飞快……看来，湖南人比湖北人更倔强，更能吃苦。

最使父亲高兴的是，他小时候曾经跟随祖父到过武昌，那时，他在洪山奥略楼吕祖祠看见过八仙之一的吕洞宾雕像，还有一块传说是吕洞宾睡觉时留下印记的大石板。这次去，居然又见到了那块大石板，依然还是原先的模样，一晃几十年，真是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啊！父亲讲着、讲着，他的神情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的光景。

让父亲高兴的另外一次是1955年春节。这个春节，父亲脸上的喜悦持续了好多天。春节前几天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大姐都从外地回来了，加上我们的外婆、小姑姑、父母亲，还有我们三个小的，全家十一口人，团聚在一起，这可是多少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团圆啊！1949年以前，弟弟不满三岁，哥哥、姐姐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念书，即便是寒、暑假，也是你来我往，很少有全家欢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只有这一次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家大团圆，这也是父亲晚年时惟一的一次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性格内向，平时不苟言笑，往往使人觉得清高，甚至有些严厉。其实，父亲的内心很善良，待人很诚恳。

解放前，在烟塘住家时，当地有一种民间福利事业，叫做“送瘫子”，村民为了照顾当地的可怜人，将无依无靠、下肢瘫痪的残疾人，用一个特制的带雨篷的木轿（形状有点像两头齐平的木船，平时残疾人以此为家，吃住都在这轿子里），将他们抬到家境较好的人家门口，让这家供他吃喝几天，然后，再转送到另一家去。每次遇到“送瘫子”这样的事，父亲总是亲自安排，好言好语相待，三顿饭，都是父亲将一只装满饭菜的大碗和一双筷子送到残疾人的手上，还叮嘱他：“慢慢吃，不够再添。”旧社会穷人多，有时候，经常有要饭的乞丐上门，我们家喂的黄狗见了生人就汪汪叫，父亲便赶紧走出去，先把狗邀开，一边对乞丐说：“不用怕，这只狗不咬人。你稍等等。”然后返回屋，添上一大碗饭菜，递到乞丐的手上；要是碰上家中还未做饭，就舀一碗米给他。每当逢年过节，有些唱“莲花落”、送财神、赞土地、玩龙灯、耍狮子的穷艺人走街串巷地来到我家时，父亲从未嫌弃他们，总是客客气气接待，表演完了都要给些赏钱。

父亲平时沉默寡言，不善言谈，显得有些孤僻。其实早先的父亲并非如此。

十多年前，我回湖南探亲，见到了一位远房叔叔，他年轻时曾经邀父亲一起去日本留学。据他讲，父亲在中学读书住宿时，性情并不沉闷，而且比较活跃，常常与同寝室的学友聊天、讲故事，说些幽默的笑话。父亲年轻时的这种开朗性格，与后来我所感受到他的孤僻实在相距甚远。我想，可能是父亲以后遇到的波折太多，不顺心的日子太久，精神长期郁闷的结果。不过，父亲的幽默感，却仍然保留着。

湖南的盛夏常常有这种情况，太阳底下飘几点雨，下雨隔牛背，当地人戏称为“牛背雨”，指下雨的范围极为窄小，以致可以用牛的脊背来分界，用来形容牛背这边有雨而那边却滴雨不下。

夏日的夜晚，我们坐在天井中乘凉，父亲扇着蒲扇给我讲故事，他说，有一年夏天，在乡间的小路上走着一位身穿长衫，手摇折扇，悠然自得的老先生。忽然，大太阳底下，下起一阵片雨，稀稀落落的雨点飘飘洒洒地浇湿了老先生的衣裳，他一边走，一边抚摸着自已的长衫，发觉长衫的前面被雨淋湿了，后面却是干干的，于是乎，大发感慨：“明明是个大晴天，怎么说着说着就下起牛背雨来了，怪不得我的长衫一边湿，一边干啊！”听到这里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父亲也笑了。

五

父亲读过私塾，上过中学，写得一手好楷书，字体端端正正，中规中矩，娟秀而典雅，只是少了几分遒劲和力度，真是字如其人呐！

解放后，父亲因为成分不好，身体又患病，不能参加什么工作，赋闲在家。虽然，平日常也没有像样的衣服可穿，但穿出来仍然清清爽爽，斯斯文文的，浑身上下都透出一股书卷气。

在湘潭市三义井住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我放学回家，看到我家门口围着一些人，一个满头长发，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的三十来岁的男子站在人群中间，摇头晃脑地唱着京戏：“一马离了西凉界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……”好像是在唱“武家坡”，这男子边唱，边用手拍打着节奏，要论唱功，自然没有戏台上的须生唱得那么好，可细听起来倒也字正腔圆，有板有眼，很有些京戏的韵味。时隔不久，我又见到了这个人，他正站在我家门口彬彬有礼地与父亲闲聊，看起来聊得还蛮起劲。过后，我困惑不解地问父亲：“爹爹，他是什么人，全身邋里邋遢的，还到处唱京戏，怕是精神不正常吧，是不是要饭的？”父亲显得有些伤感，叹气说：“唉！又是一个可怜人，他姓江，别人都叫他“江疯子”，其实他并不疯，思维、说话都很清晰，你可能没想到吧，他还是一个正牌的大学生哩！搞不清什么原因，竟然没有工作可做，如今穷困潦倒，流落街头，没有法子，只好唱几句京戏，靠别人施舍几个钱来混日子。真是可惜，可怜！”父亲一边说，一边摇着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那个乞丐般的男子，周围的人都瞧不起的人，父亲却不嫌弃他，居然还会和他客气地攀谈起来，真有点不可思议。

唯一的解释，大概都是读书人，有共同语言的缘故，或许还有点同病相怜吧。

父亲年轻时和我们年轻时一样，心气高，对未来充满着幻想，很想出去闯闯世界，干一番事业。父亲中学毕业后，原准备与我们的远房叔叔一起，漂洋过海去日本留学，但遭到了祖父的坚决反对，满脑子封建思想的祖父大发脾气，拿起一把菜刀，站在天井中，警告父亲：“谁要是敢出远门，就砍断谁的腿！”向来孝顺的父亲，凡事逆来顺受的，不想让祖父生气，只好屈从长辈的意旨，放弃自己的打算，眼睁睁地看着我那远房叔叔畴躇满志地去了日本。父亲的这一美好愿望化作泡影，以失败告终。在封建家庭礼教的束缚下，碍于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”的古训，为了照顾父母，父亲不敢再提什么出远门的事了。从此，父亲一直生活在家乡，他的理想和抱负无法施展，以后也再没有什么机会了。

祖母在世时，四世同堂，各房都未分家，祖母看中了父亲的忠厚老实，将一大家子的钱粮账目都交由我父亲掌管——这样的好事别人求之不得，但对于父亲来说却是个麻烦事。我们的大伯是典型的富家公子哥儿，享受着祖上留下的基业，整天不做正事，只知道打牌赌钱、养鸟、斗蟋蟀。有时赌钱输光了，就跑来找我父亲拿钱，而且为数不小，还以老大的身份连骂带训地逼着父亲给钱，弄得父亲左右为难，常常只得忍气吞声。

这件事是后来母亲聊家常时告诉我的。父亲重礼义，讲孝悌，从未在我们面前谈过上一辈和同辈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也从不在亲友面前议论他们的是非，天大的事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忍受着。

虽然，祖父和伯父对我父亲是这样的专横不讲理，但父亲对我们却是另一种态度——明智而开放，他和母亲一道，勉励我们到外地去求学读书，解放前夕，又鼓励自己的儿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让我们到外面去学知识，去闯自己的事业。父亲从来不认为儿女是属于他自己的，也不要求儿女留在自己身边为家效力，为自己养老送终，这样便可以使自己的生活过得稍微舒适、轻松一点。父亲一心为子女着想，不为个人打算，还不顾自己体弱多病，竭尽全力支持子女的精神，深深地感染了我们，也教育和培养了我们。

我们之所以有今天，全是父亲和母亲心甘情愿地忍受贫穷和困苦所换来的，在当时生活极为艰难的情况下，父亲能有这种宁愿自己吃苦，也不能耽误孩子读书，再苦也不能误了孩子前途的思想，真是很不容易的。

六

1953年，我们家搬迁到湘潭市三义井后，全家的生活虽然比在湘潭县赵家岭时有点改善，但仍然非常艰辛。那时在家的有七口人，二姐在中学读住读，我读小学，弟弟刚上学。家里的收入全靠大哥、三哥寄回家的三十来元钱维持生活，平均每人每月约五元钱。当时的米价是一角多钱一斤，在家六口人，买米需要十六、七元，买煤、买油、盐和照明用的煤油需要七、八元，剩下的钱，用来买菜和杂用，平均下来每天开支不得超过两角钱。为了节省，只好去买六、七分钱一斤的干蚕豆和干红薯丝掺在饭里吃，这样吃还可以少吃点菜。父亲长期有病在身，既无钱上医院看病，也没有可能去改善伙食，增加营养。平时，我和弟弟在上学的，又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才可以吃三餐。父亲、外婆、小姑姑他们却只吃两顿。中午，我和弟弟两人共吃三分钱的原酱（做菜用的）下饭，稍好一点，可以花五分钱买一块榨菜两人分着吃，或者买一小包盐花生米下饭，每人可分得三十余颗。晚上，全家人经常吃的是清水白菜。那时，母亲白天在“军烈属被服厂”干活，天黑了，才从“十八总”走很远的路回家，累了一天，回家吃的依然是一碗白饭和留在锅里蒸得发黄的一碗白菜。有时为了给父亲改善一下生活，就在刚出锅的热饭中加一块指姆大的猪油，倒上一点龙牌酱油，闻起来很香，父亲看到我和弟弟发馋的样子，很不忍心一个人吃下去。

生活的艰苦，对我们来说，已经习以为常了。但有时，仍然使人感到伤心。

那时，我正在离我家不远的“湘潭市师范附属小学”（即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曾经就读过的“昭潭小学”，现在的校名是“湘潭市曙光小学”）读六年级。一天下午，我放学回家，

老远就看见父亲站在家门口，这已经是他长久的习惯，每天这个时候，总是站在那里，等待着我和弟弟放学回来。当我走到父亲跟前时，见他那刚刚剃过的头顶上很明显地留下两道血痕，我问父亲：“爹爹，你怎么搞的，剃头还剃出血来了？很痛吧。”父亲似乎不愿让我再看到伤痕，把头抬了起来，爽朗地笑笑：“五分钱，五分钱剃个头，你还能要求有好高啊！”父亲毫不在意，我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，父亲大半辈子并未过得舒适，现在我们差不多都长大了，生活仍是这样的艰难，没想到，连剃个头也要吃苦。平时，我和弟弟理发，都是到附近小店子去理，一角钱一个头。父亲则总是找挑着剃头担子的老头来剃，老头眼神不好，剃头刀具又不行，父亲只好挨刀子——父亲就是为了省这区区的五分钱。其实，我很清楚，父亲并非连五分钱都没有，父亲上衣口袋里总还是有几角钱的，可是他为了这个家，却怎么也舍不得花呀！

父亲生前没有什么嗜好，很早以前抽点水烟，后来因气喘病，也就不抽了。他不喝酒，也未见他打过牌。平时父亲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，有时也找点报纸来看。他还会吹洞箫，月白风清的夜晚，他常常独自坐在房间里，吹着“满江红”的曲调，低沉、悲愤的情感从箫声中传出来，似乎在倾诉着他那忧郁、愁闷的心境。他所看的书，大都是文言文的古典书籍，尤其爱看《聊斋》，我想，很可能是作为逃避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吧。在我印象中，父亲没有什么专长，但他善于讲故事，讲起故事来，语调不高，声音平缓，娓娓道来，幽默而风趣。父亲平时讲的大多是《聊斋》中的故事，四大名著中只讲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一次也没有讲过。父亲也许是受过去有句老话的影响，男不看“红楼”，女不看“西厢”吧。倒是母亲爱讲《红楼梦》里的故事给我们听。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讲《西游记》中唐僧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，也喜欢听《聊斋》中的《偷桃》、《种梨》、《崂山道士》之类的故事。至今回想起来，父亲给我讲的故事，似乎都是有目的地选择过的，那些很恐怖、很吓人的鬼故事，他从来都没有给我讲过，这也是他教育孩子时所费的一番苦心。

七

我五岁时，父亲先教我认方块字，他用硬纸剪成一小块一小块，再写上浅显易懂的字来教我。后又教我写毛笔字，先从握笔教起，看到我姿势不对时，耐心地手把手纠正我握笔，一笔一画地让我练习描红本上的字。那时，父亲的气喘病已经很明显了，他站在我身旁，急促的喘息声我都清楚地感觉得到。后来，母亲告诉我，父亲从小体弱，得病也不是这一阵子了。中年时就气血不足，晚上睡觉即使是夏天，也要穿长裤睡，冬天还要加厚厚的长统袜子。父亲去世前的两个冬天，母亲为了使父亲睡觉暖和一些，总是整夜地睡在父亲的另一头，将父亲的双足紧紧抱在胸前，用自己的体温去暖和父亲的双脚。我那时已经十二岁，母亲为了父亲，也顾不得难为情了。

1956年的早春，料峭春寒，湘潭的天气显得格外的阴冷。父亲穿着一套灰色的棉衣服，头上戴着一顶可放下耳罩的棉帽子，这是我记忆中穿得最好、最合体的一身衣服。这套衣服是母亲用大哥寄回的钱，买来棉花和布料亲手缝制的，父亲一直穿在身上，直到去世。

父亲去世的情景，想起来就像不久前发生的事一样，永远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那时，我们住在三义井，寒冷的气候使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，因为贫困，没有能力请医生，药也没有，一直拖着，病痛的折磨使父亲日渐消瘦，卧床不起已有好些日子。父亲去世的前三天，精神忽然好了许多，可以起床，有时在堂屋里走上几步，在旧太师椅上坐一坐。邻居家的熟人过来探望，见到父亲能走动了，便安慰他说：“今天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。”父亲无奈地摇摇头，苦笑一下：“恐怕是回光返照。”现在想起来，冥冥之中，父亲果真有某种预感吗？

三天后的晚上，大约十点多钟，我做完功课还未睡，屋里点着煤油灯，冷风吹过来，微弱的灯光忽闪忽闪半明半暗。父亲要上厕所，母亲让我帮着她把父亲扶起来，一起搀扶着穿

过后堂屋，来到放着尿桶和马桶的厕所间。父亲要小便，虚弱的身体已不能站立，只好坐在马桶上解，解完后，我搀扶着他费劲地慢慢站起来，父亲佝偻着身子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其实是对我说：“时候不早了，你去睡觉吧，明天还要上课。”我和母亲将父亲小心翼翼地扶回床上，父亲坐在床边，呼吸急促，喘息了好一阵，待稍微平静后，断断续续地对母亲说：“……你这一辈子跟着我，没有享到什么福，倒是吃了许多苦，受了不少罪，我是很对不起你的……我只有一点算对得起你，我从来没有在外面找过女人。”父亲喘了喘气，接着说：“我死后，棺材里不要放石灰，放白糠头灰（谷壳隔氧烧出来的灰），我怕呛。”母亲这时很悲伤，强忍着，没有让眼泪流出来，低声地安慰父亲：“你看，要不要给孩子们发个电报，让他们回来？”父亲摇摇头，声音非常微弱却很清晰地说：“不用了，他们工作很忙，不要影响他们。”没想到，这竟是父亲最后的留言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刚起床，母亲含着泪悲痛地告诉我：“你爹爹昨夜过世了。”我那时真不懂事，只觉得心头空了一块似地一阵恐慌，也不见得怎样地悲痛，现在想起来，真是太不应该了，太不懂事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家里忙着办理父亲的后事，人来人往，全是母亲在料理。父亲的去世仿佛让我一下子长大了许多，也懂事一些，在准备父亲丧事的这些日子里，我作为在家的长男，总是帮着母亲做点零星事情。当周围附近的亲戚朋友来我家吊唁时，母亲总是招呼我，对我说：“四儿，过来，谢谢人家。”于是，我便恭恭敬敬地走到宾客面前，双膝跪下去，深深地磕一个头，以表示对他们的谢意。这也是我为父亲所做的最后一件事。

出殡的那天，堂屋里站满了人。要封棺了，棺木放在堂屋中央，头朝里，脚朝外。母亲牵着我 and 弟弟的手站在旁边静静等候。当棺木盖挪开时，我清楚地看到父亲安详地躺着，这时，母亲泣不成声，泪流满面地拉着我和弟弟奔向棺木前悲痛欲绝地呼喊：“你们快来看看你爹爹，你们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！”一阵悲痛袭上我的心头，胸口感到被石块压着似的沉重，眼泪不由簌簌地流了出来，我默默地注视着父亲苍白的面容，一桩至今也无法解释的奇怪事情发生了：只见父亲闭阖着的双眼，忽然间，从左眼眼角流出一滴黄色的泪珠，久久地停留在面颊上……难道这是父亲的大脑还有知觉，听到母亲悲伤的哭喊声后作出的应答；还是父亲放心不下我和弟弟，牵挂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而流下的眼泪？这一切都无从解答。

出殡的时辰到了，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，伴随着阵阵鞭炮声，棺木由四个请来的农民缓缓地抬起，母亲抽泣着，带着我和弟弟紧跟在后面护送。白色的灵幡在前方飘动着，亲友组成的送葬队伍沿着门前的石板路缓慢地走出了三义井。父亲的灵柩，将送到湘潭县乡下颜子塘去安葬，路途遥远，来回需要两天的时间，母亲不让我 and 弟弟继续跟着，嘱咐我们：“回去吧，听话，好好在家读书，不要把学业耽误了。”我和弟弟停立在路旁，目送着母亲和送葬的人群渐渐离去，直至很远很远……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，他的一生，从一个比较富裕的大户人家子弟，到一贫如洗的平民百姓，他经历的坎坷和磨难实在不少，他所受的苦难也很多，他大半辈子都在忍受各种痛苦的煎熬，在压抑的环境中委曲求全地度过。他这样做，完全不是为了他个人，而是为了整个家庭，为了他的孩子，他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事业，也未能出人头地，但他唯一值得骄傲的是，他和母亲一道，历尽艰辛，饱经沧桑，最终将七个子女一个个都培养成为了品德端正的读书人，真正尽到了一个做父亲应尽的责任，这一点，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的。

2005年6月写于重庆观音桥

怀念母亲

那是1968年的盛夏，我从太原送母亲回武汉的途中。

火车奔驰在广袤的原野上，车头不时地冒出滚滚的黑烟，长长的烟雾上下左右地翻腾，远远望去，像一条张牙舞爪的蛟龙。

车厢外，晴朗的天空看不到一丝云彩，午后的太阳将大地烤得火辣辣的，仿佛要把地上的一切都烤得枯焦方肯罢休。

车厢里，乱哄哄的，不论是硬坐还是硬卧车厢，还是过道上，到处都挤满了人，有的站着、有的靠着，坐着、蹲着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，闷热的空气里散发出令人难闻的汗腥味和烟草臭味，车上的广播开得山响，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播放着当时最时兴的歌曲：“大海航行靠舵手，万物生长靠太阳，雨露滋润禾苗壮，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……”

—

列车像发了疯似的向前狂奔。

我陪着母亲坐在开着的车窗旁，母亲心事重重地凝视着窗外，似乎那里有什么值得企盼和向往的。然而，远处只有一望无际的原野和稀稀拉拉的农舍，移近过来，又不断往后退去，稍纵即逝……

窗口风很大，逆风而坐的母亲被风吹得眯起了眼睛，头发也被吹乱了，望着母亲消瘦憔悴的面容，我心里感到非常不安，我发觉母亲这段时间真的老多了，原先花白的头发现在几乎全白了。

“姆妈，风太大了，我把窗户关小一点好吗？”我关心地问。

“你不热吗？你看你，额头上都冒汗了。”母亲却担心起我来了，掏出手绢，佝着身子怜爱地帮我揩去额头上的汗水。

“我没什么。您的病还没怎么好，吹不得风的。”我站起来，用力将窗扇往下拉到合适的位置，直到风吹不到母亲的头部为止。

母亲平时有喝茶的习惯，喜欢喝湖南产的那种清茶。如今天气又热，我也有些渴了，便拿出茶杯，放好茶叶，费劲地挤过人群，向隔着几个车厢的开水房走去。

正当我端着热茶，小心翼翼地护着杯子，侧着身子走回车厢的时候，一阵嘈杂的训斥声突然从身后传来：“快走，老实点！”接着便听到“啪！啪！啪！”的皮带抽打的声响，我不由倒吸一口凉气，感到背脊一阵发冷。“造反有理，革命无罪！”“打倒一切牛鬼蛇神！”，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！”震耳的口号声接连不断，尖锐的喊叫充满了整个车厢。我赶忙往旁边躲闪，只见一个瘦骨嶙峋，满头蓬乱的白发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老人弯曲着衰弱的身子，踉踉跄跄地走在前面，他的身后跟着七、八个盛气凌人、耀武扬威的学生红卫兵，他们头戴军帽，身穿草绿色军装，衣袖挽得高高的，手臂上戴着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标，为首的一个拿着一根宽宽的军用皮带，不时地高高举起，一路上狠狠地抽打着这个年龄足可以当他爷爷的人。老人脸上痛苦地抽搐，低着头，佝偻着背，颤颤抖抖，跌跌撞撞地走着，看着实在让人心酸……

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，我原本不安的心更加焦躁起来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猛然袭上心头，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，我不该在这个时候送母亲回家，真不该赶在这个动乱时刻回武汉，悔恨自己没有坚持让母亲留下来。

我赶紧加快脚步，迅速地来到母亲的身边。

“怎么了？你不舒服？”母亲抬起头看着我，觉察出我的神情有些异样，关切地问。

“没……没什么，天气太热了，您喝口茶吧。”此刻，我根本不敢把刚才所见到的情形

如实告诉母亲，惟恐增加她的思想负担，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，夜幕开始降临了，列车呼啸着奔驰在铁轨上，火车轮子撞击着轨道发出“咣当，咣当”的响声，一路上不停地震动着，摇晃着。

列车从石家庄转入京广线时，已经是半夜时分，母亲早已睡下了。

我躺在卧铺上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脑子里不时浮现当天红卫兵押解老人的情景……很有可能是哪个学校的造反派押送反动学术权威回原籍的……真不该让母亲回武汉。我又一次后悔起来。

多年来，母亲一直住在武汉，那是我们温暖的家——母亲、大哥、我和弟弟都住在一起。一年前，母亲去了太原二姐家。

北方的冬天，比南方冷得多，寒风刺骨，滴水成冰，室内又没有暖气，只有烧煤的铁炉子。开春不久，母亲多年的肺心病犯了，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只好住院。治疗了两个多月，病情才稍稍稳定下来。

二

母亲在太原住院时，正赶上我大学毕业分配。

按理说，我早该1966年6月如期毕业的。可是，谁也未曾料到，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开始了。

“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”，文化大革命这把火，让我们这一届大学生也未能幸免于难。毕业分配时，全国山河一遍红，派性斗争不断升级，先是口诛笔伐的“文斗”，后来发展成真枪实弹的“武斗”，许许多多机构都瘫痪了，毕业分配工作根本无法正常进行。

好容易熬到了1968年7月，总算拿到了久拖未决的分配通知单，这时母亲仍躺在医院里治病，我心急如焚，立即启程，从哈尔滨赶往太原。

在医院里，母亲见到我，一阵惊喜，也不管病情的轻重，便急切地要我陪她回武汉，只是因为病还未好，主治医生坚决不同意出院，母亲这才不得已只好继续住院一段时间。

当时，全国各地的生活条件和物资供应情况都不好，粮食定量，肉每人每月供应一斤，油半斤，其他副食如鸡蛋、豆腐之类也都凭票限量供应，而且少得可怜。医院的伙食之差是可以想像得到的。

在母亲住院的病房里，有一个山西本地的老太太，满脸皱纹，个子矮小干瘦，待人倒很热情。有一天，我带点汤菜去看母亲，见母亲正在吃一块黄褐色的肉食，这是老太太从家里带来让母亲尝的，食物是面粉裹肉用羊油炸的，膻味很大，老远就闻得到，真有些让我受不了。然而母亲这时却吃得津津有味……见到这样的情景，我心里不由一阵酸楚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是从不吃肉的，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年代也如此。小时候我曾问过母亲，她告诉我，因为幼年时，有次吃肉吃得太多，吃伤了的缘故，以后再也不想吃肉。而今，母亲不仅吃肉食品，而且是羊油炸的……想到这些，心里就难受。

在住院的这段日子，母亲归家心切，三番五次地催促我送她回武汉。二姐很舍不得母亲走，再三挽留多住些时日。我也竭力劝阻母亲，“现在时局动乱不安，您还是暂不回去为好。武汉人缘太熟，知根知底，运动一来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，说不准惹出什么麻烦事情来。”

但母亲决心已定，执意不肯。母亲是个很果断的人，决定了的事就要去做。

我意识到，母亲那极强的自尊心和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，她老觉得住在女婿家里那是外姓人的家，虽然女儿、女婿都很孝顺，但总不像在自己的儿子家里那样心安理得，似乎只有跟儿子住在一起，才合乎规矩，才名正言顺。也许母亲怎么也没有料想到，就是她这种守旧的传统观念和太要强的自尊心，给她带来的竟然是灾难性的打击和最终的不幸。

我明明知道，母亲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封建思想意识残余在作怪，荒谬得很，而且后果很难预测，说不准还存在着极大的风险，可是母命难违，我只好照办。

三

母亲回到了武汉，我又待了几天，一切安排妥帖后，我准备走了。

走的当天，母亲比平时说话更少，只是与我往常出远门时那样，默默地帮我收拾东西。早些天，母亲就开始为我作准备了，翻箱倒柜找出一件件衣物——从春到冬四季穿的，洗得干干净净，在太阳底下晒得干干的，再折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一旁。现在母亲又忙着给我准备毛巾、牙刷、牙膏，小梳子、小镜子，甚至连路上喝的茶叶、吃的水果都一一考虑得很周全。母亲将这些物品仔仔细细地整理好，然后一件一件亲手放置到我的藤条箱和网袋中。

我提起箱子，站在门口向母亲告别：“姆妈，我要走了，您自己多注意身体，好好保养。”母亲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呆呆地看着我，目光中充满担忧和怅惘，好像生怕失去我一样。忽然，她想起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，步子麻利地返回房中，从她的枕头边翻出一双布鞋来——这是母亲在我晚上睡觉后，独自一人坐在我床边连着几个夜晚赶着做好的。母亲拿着布鞋走到我跟前，放在我的手上，嘱咐说：“出门在外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，记住，以后下了班把这双布鞋换上，布鞋软和、透气，比穿别的鞋舒服。”说这句话时，母亲眼眶里噙着泪水。当时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次告别，竟成了我与母亲的最后永别……我真后悔，那时，我只顾自己匆忙地走，怎么不多跟母亲说上一两句体贴的话，让她心情也好受些……

我从武昌来到汉口江汉关码头上船，乘坐一艘四层的大客轮启程赴重庆。一路上，天气阴沉沉的，轮船一直在烟雨濛濛中行进。经过三峡时，游客们都涌向船舷的甲板上观看两岸的风光，我却无心去浏览周围的景色，胸口总像压着一块石头，堵得很，脑子里不时浮现出白发苍苍、身子骨又很弱的母亲来，心里没着没落的，像丢失了什么一样。

轮船溯流而上，行走得很慢，在船上极无聊地过了五天四夜。

船到重庆后，从朝天门码头上岸，乘公交车至两路口，再转车至新山村，到山坡下的第十八冶金建设安装工程公司去报到，一切安顿后，我意识到，我的另一段人生旅程即将开始了。

在单位，我和那时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，被安排到基层当工人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。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学校，缺乏劳动锻炼的文弱书生，一下子来到工地，整日地去干肩挑手抬的体力活，自然是很艰苦的。然而，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相对的，既没有绝对的好，也没有绝对的坏。

大学读书时，我患有神经衰弱的毛病，常常夜间失眠。自从当了工人，这毛病便不治而愈，整天笨重的体力劳动使我疲乏不堪，晚上倒头便能睡着，即便是睡在大通铺的简陋工棚里，也从未失眠过。可是，在我工作还不到半年的时间，有一天晚上却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，这一晚，时睡时醒异乎寻常，一种莫名的烦躁，让我心神不宁，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。究竟是什么原因，我也弄不清楚。

没过几天，突然接到武汉的大哥写来的信，信中悲痛地告诉我：“母亲已经去世了……”猝然间，有如晴天霹雳，五雷轰顶，我的脑子“嗡嗡”作响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，连信上的字也看不清了，喉咙哽咽着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难受，眼泪顺着面颊一直往下流……我惶恐地意识到，母亲不在了，家也不成其为家了，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即使在很远的地方，一想到家中的母亲就心头暖暖的，没有了家，一个我所依恋的家再也不会有了。父亲去世时，我心头只是感到空了一块，现在，整个心都被掏空了。

让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，大哥在信中告诉我母亲去世的时间，恰巧就是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好的那个夜晚，人们常说，“母子连心”，难道人世间真有心灵感应这样的事？

母亲就这样地走了，走得这样突然，我没有在她的身边，没有能够见上最后一面，也未能聆听到她临终前的话语，甚至，今后连尽点孝心的机会都没有了……

母亲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带着未了却的夙愿，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。

四

我的母亲生于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农历八月十五，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，一个

团圆的日子。

外婆说，母亲出世时，恰恰是花好月圆的中秋佳节，那时，外公在扬州做生意，经营茶叶生产和加工，家境也很富裕。

不幸的是，母亲一岁多，外公就因病去世，留下外婆和幼小的母亲，孤儿寡母，相依为命。外婆年纪轻轻，十七岁就开始守寡，含辛茹苦地将母亲抚育成人。后来因为时局动荡，家境中落，外婆带着母亲迁居湖南，这才有了父亲和母亲的结合。

外婆告诉我，母亲小时候很懂事，文文静静的，心地很善良。外公去世后，外婆靠刺绣和帮人家缝制衣服谋生。年幼的母亲没人照管，但她很乖，自己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，挨着外婆的身旁，不声不响地玩，用不着外婆操心。与邻居小朋友一起玩耍时，有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，都要送给他们吃、给他们玩，从小就懂得友爱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对周围的人也是这样，总是以诚相待，宽厚为怀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1948年秋，母亲带着我乘轿子到姜畲乡下佃户家去收租，这也是我家最后一次收租。因兵荒马乱，又遭遇旱灾，收成很不好。到了佃户家，佃户请求母亲免去这年的租谷，母亲体谅到他们家缺吃少穿的贫穷状况，不忍心再给他们雪上加霜，不仅没有收他们的租，就连我们路上带的干粮——法饼（湘式糕点中的一种方便食品）也都送给了佃户家的小孩。

母亲为人温和、仁慈，过去家境好时，凡亲朋好友、邻居熟人遇到困难向母亲借钱，有时，母亲明明知道人家穷，以后很可能无力偿还，却仍然借给他们。我们有时不理解，觉得完全是无去无回的事，不该借的。母亲总是说，“济人须济急时无”，人家来借钱也是迫不得已，这是给人家救急的，并不指望这些钱还一定回得来。

外婆还告诉我，母亲的小名叫“海宝”。外婆解释说，因为是在离海边不远的地方生的，就取成海里的宝贝的意思。外婆曾在扬州、苏州、上海这些地方生活过，我猜想，母亲大约是在上海出生的。

无意中知道了母亲的小名，我很得意，似乎发现了一个大秘密，不谙世事的我，故意调皮地问母亲：“姆妈，您的小时候叫‘海宝啊！’弄得母亲很不好意思，装成生气的样子对我说：“小孩子，不许乱说，没大没小，没有一点分寸！”看着母亲尴尬的样子，我像做了恶作剧似的捂着嘴暗暗地笑了。

母亲年轻时很漂亮，身材也好，平时爱穿旗袍，有时也穿西式的翻领时装。亲戚朋友都说母亲秀外慧中，端庄贤淑。尤其难得的是，她有一颗善良、慈爱的心，在她心里总是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，和和睦睦。她常对我们说，家和万事兴，平安就是福，我不求什么荣华富贵，只要全家人平平安安，你们争气，就是天天布衣蔬食、粗茶淡饭，也胜过金玉满堂、美味珍馐。

母亲幼年读过《三字经》、《女儿经》、《弟子规》、《增广贤文》之类的古典启蒙书，后来又进过洋学堂，学过会计业务。母亲的算盘打得很好，我们小时候学珠算启蒙，打“六百六十六”就是母亲教的。解放前，家境好的时候，平日有空，母亲爱看《红楼梦》和《啼笑姻缘》之类的言情小说，闲时打打麻将牌，最喜欢的还是看戏。

听大哥讲，早年，我家在长沙府正街居住时，母亲还带着子女去看电影，听京剧和湘剧，湖南花鼓戏是不看的。那时的花鼓戏在言语上大多带有男女之间的挑逗，较为低俗，动作上也显得有些流里流气，母亲怕这样的戏对我们小孩影响不好，便不让看。有一次看京戏，算是最奢侈的，那是看梅兰芳演出的《贵妃醉酒》，八块袁大头（银元）一张票，这一张票的钱当时可以买几担米，相当于一个佣人的两个月工资还多。

现在想来，母亲喜欢看戏，自有她的一番道理，也许不单是为了娱乐消遣，或许还想从这些戏曲中让我们从小就受到文化艺术的陶冶。

母亲还经常借用书中或戏里的故事情节来教育我们。我从小就听母亲讲过“岳母刺

字”、“苏武牧羊”、“孟母择邻”、“头悬梁锥刺股”、“凿壁偷光”、“囊萤映雪”的典故，这些励志教育和勉励人们刻苦读书的故事，在我幼小的心灵上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
有一次，母亲还给我讲了一出《三娘教子》的戏，印象极深，至今难忘。戏中的情节是这样的：

三娘早年丧偶，留下一子，靠织布为生。儿子六、七岁时，开始上学了，但儿子调皮、贪玩，不懂得好好读书。一天，儿子逃学，三娘知道后非常生气，将儿子叫过来，厉声地对他说：“我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地织布，就是为了你好好读书，你不读书，贪玩逃学不学好，那我织布又有何用！”三娘气愤得不得了，拿来剪刀将织布机上辛辛苦苦织好的布全都剪断，一把拖过儿子，举起竹片就要打。此时，家里忠心耿耿的老仆人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，担心小主人挨打受苦，于是，赶紧将不懂事的儿子拉到一旁，悄悄地向他低声嘱咐了几句。年幼的儿子听从老仆人的话，乖乖地走到三娘面前，双膝跪下，仰望着母亲，泪流满面地哀求道：“娘啊！孩儿知错了，请娘亲打儿时高高举起，轻轻落下，打儿一下，如同十下，打几十下，如同百下，打在儿身，痛在娘心……”三娘听着小儿子的哭诉，看着这没爹的可怜孩子，内心如同刀绞，伤心得不已，手中的竹片停在那里怎么也落不下来……骤然间，三娘扔掉手里的竹片，一把紧紧地搂住儿子，母子俩抱头痛哭……

母亲讲故事时很投入，讲得很动情，我听了非常感动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我们从小就是在母亲的这些故事中教育长大的，母亲的教导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子里。

五

自从母亲嫁到我们唐家，外婆就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，外婆只有母亲这么一个女儿。母亲对待外婆非常尊重，极为孝顺，有时从街上买来什么好吃的，总是让外婆先尝；有什么好看的、新奇的东西，总是让外婆先看、先用；即使外婆做了不适当的事，母亲也是轻声细语，好言相劝，从不抱怨，更不会在我们面前说外婆的不是。母亲总觉得外婆年纪很轻就守寡，好不容易把她拉扯大，吃了不少苦。抗日战争时我们全家逃难，留下外婆一人独自为我们守家，后来外婆又摔伤了腿成了残疾……因此总想让外婆多享点福。她经常对我们说：“你们外婆这一辈子过得很不容易，你们要好好地待她。”

外婆是一个有主见，聪明能干的人，也是一个敢作敢为，自立能力很强的人。母亲给我讲了一件闻所未闻的事。

那年，外公患了重病卧床不起，气息奄奄生命垂危，家里人很着急，请来了当地很有名气的郎中。

这位名医的确非同寻常，单是切脉时的排场就颇有些与众不同的派头，他要求保持室内绝对安静，闲杂人员一律不得入内，就是病人亲属也不得在屋内随意走动，任何人都不准发出一点声响，甚至连墙上挂的自鸣钟发出的“嘀嗒、嘀嗒”声他还嫌干扰太大，非叫人将钟摆摘下来不可。如此的规矩、这样的气势大家从未见过，严肃的气氛将所有的人都给镇住了。名医切完脉，叫人打水洗完手，沉思着走到桌前缓缓坐下，提起笔，舔舔墨，气定神闲地写完药方，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药方已经开好，不过，药引还得你们自己去准备，药引是——”他停顿一会，慎重其事地说，“人肉一片，要新鲜的。”顿时，令在场的人一个个惊诧得张口结舌、目瞪口呆。

大家惊恐之时，年轻的外婆却显得很平静，默默地站在一旁，静静地听着，整个心思只是想着外公的病能早一天康复。

药取回来后，谁也没想到，外婆这样一个弱小女子，竟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和胆量，走进厨房，挽起袖子，毫不犹豫地拿起刀来，横下心，咬紧牙，硬是在自己的手臂上，血淋淋地割下一块肉，活生生地将它放入药中……

但是，这付匪夷所思、骇人听闻的药引，终究未能像人们期盼的那样，显现出它的神奇